

# 佛教东传与中国的狮子文化

刘自兵

(三峡大学 湖北宜昌 443002)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phenomenon i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Lion is not a native animal but Lion Culture is rich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People's love for this exotic animal has a direct connection with it's important place in Buddhism and Buddhism transmission.

Key Words :Buddhism Lion Lion Culture

**内容提要**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境内不产狮子动物,但关于狮子的文化艺术却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种产自异国他乡的动物之所以受到中国民众的青睐,与它在佛教中的地位,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

**关键词** 佛教 狮子 狮子文化

**中图分类号** B94

**文献标识码** A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境内不产狮子动物,但关于狮子的文化艺术却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种产自异国他乡的动物为什么受到中国民众如此青睐呢?这除了狮子动物本身所具有的威力外,恐怕与中国社会崇拜灵兽的心理有关。然而在中国境内具有威力的动物比比皆是,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也已经把其中不少的动物进行神化并视为图腾加以崇拜,如龙、凤、虎、犬等等。狮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相当的隔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由这种动物衍生的文化却长驱直入地席卷中国各地,天下靡然相从,并迅速在中国社会扎下根,与附丽于中国本土动物身上的文化和平相处、相得益彰。要揭示这种现象,只有从佛教的东传说起。

## 一 狮子是印度佛教的护法者

狮子的原产地主要在非洲和亚洲,而亚洲又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南亚次大陆。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中国同西域各地的交往逐渐频繁起来,对西域自然环境的认识逐步加深,发现并认识了在本土没有的一些动物如狮子、符拔、犀牛。《汉书·西域传》云:“乌弋地暑热莽平……而有桃符、狮子、犀牛。”荀悦《汉纪·武帝纪》亦曰:“乌弋国去长安万五千里,出狮子、犀牛。”乌弋即今阿富汗境

内的赫拉特,处在中亚南亚之交,这一地区今日还是世界上野生动物狮子的重要栖息地和保护区。

古代波斯以崇拜狮子为时尚,王者听政就是戴着金冠,坐在金狮座上。在波斯艺术中,有人与狮相搏共舞的场面。近年来在中国境内也发掘出了几座具有波斯文化特点的墓葬,在石椁图像中有反映人骑象或骆驼与狮子搏斗的画面。如太原隋代虞弘墓,就发现有人兽、人狮搏斗和捕猎的图像约15幅。齐东方先生认为,虞弘墓的背景是波斯文化<sup>[1]</sup>。

古代南亚次大陆对狮子也是情有独钟。今斯里兰卡国在中国晋代被称为狮子国,其名见于晋法显《佛国记》,为梵文、巴利文的意译。在佛教产生之前,印度把狮子称作“百兽之王”,并把人中的帝王比作威武迅猛的雄狮。如释迦牟尼的祖父就是“狮子颊王”,这是梵文 simhahanum 的意译,见于《大智度论》卷三、《五分律》卷十五等诸多佛教经典的记载。这种崇拜狮子的文化自然对佛教产生影响。佛教创立后,对狮子形象更是推崇备至,这对狮子形象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据佛教经典,始祖释迦牟尼有多种称号,如“人中狮子”、“人中狮子”、“人雄狮子”、“大狮子王”等,都是把释迦牟尼佛祖比作狮子。另外还把与佛有

关的东西也冠以“狮”名。如佛教经典中称佛的坐席为“狮子座”,又称作“狮子床”、“狻座”等。后来佛教在中国传播后,把佛像菩萨的台座、高僧说法时的坐席都泛称为“狻座”,甚至在后来连给僧人写信也尊称“狻座”。这里“狻”即古代文献所称的“狻猊”。《尔雅·释兽》中有“狻猊”,郭璞注云:“即狮子也。”在佛教经典中,称佛的说法,特别是始祖释迦牟尼佛的说法为“狮子吼”。另外佛经中还有“狮子身中虫”的比喻,即把狮子比作佛教特别是僧团本身,把居住在僧团内部破坏佛教的“诸恶比丘”比作狮子身上的虫子。佛教经典中有关狮子的重要比喻,还有“三十二相”中“上身如狮子相”、“狮子颊相”;“三昧”中有“狮子游戏三昧”、“狮子奋迅三昧”。总之,狮子是正面的形象。白化文先生认为:“在诸多的大型动物中,佛教对狮子最为偏爱,它似乎成为佛教在某些方面的一种象征,或说是象征物。”<sup>[12]</sup>佛教传入中国后,狮子塑像列置寺门外,而寺中狮子成为文殊菩萨的坐骑,狮子俨然成为护法者的形象。

## 二 佛教传入中国时间辨析

佛教初由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西汉末年开始传入我国内地。《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评注引《魏略·西戎传》云:“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大月氏是中亚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教又是印度传法和中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受到上层社会的信仰和崇拜,如楚王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sup>[13]</sup>桓帝醉心于佛老学说,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sup>[14]</sup>。桓灵之世,安息僧安世高、大月氏僧支谶等相继来中国,在洛阳翻译佛经。汉人严浮调受佛学于安世高,参与译事。在上层的推动下,佛教开始从上层渗入民间。东汉末年,民间佛教信徒日渐增多。丹阳人笮融大起浮屠祠,造铜浮屠像,用复免徭役来招收信徒,“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看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sup>[15]</sup>

两汉期间,佛教虽在上层社会有一定市场,但人们将它比附于黄老之学,往往将浮屠与老子并祭,这反映外来佛教传入中国初期,要附骥中国固有的黄老学说进行传播的特点,这种佛道杂糅的局面正符合佛教初入中国的地位。当时一般人多把佛教义理解为清虚无为,“省欲去奢”,与黄老学说相似,而“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也颇为流行<sup>[16]</sup>。人们造佛寺时,往往与老子祠比邻建在一起,这样似乎更能为士大夫们所接受。

与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同时,在全国不少地方

还兴起了塑造佛像的现象。考古证明,1941年四川彭山江口镇豆牙坊沟M166出土的泥质灰陶摇钱树座,时代定为东汉中期,座高21厘米,在龙虎争壁的底座上,是圆筒形插管,插管正向居中为高髻着通肩大衣的趺坐佛像,衣纹在胸前悬垂,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平置。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发现树干上铸的佛像,如1989年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晚期崖墓出土的树干自上而下纵列为5尊趺坐的佛像,像的左右两侧各铸出了3枚光芒四射的方孔铜钱,将佛像铸于树干上。1981年忠县涂井蜀汉墓出土的一些残断的铜钱上树干上也有纵置的坐像,该墓出土的陶俑,有的头上有类似“白毫相”的凸起圆饰,或亦与佛有关。1985年乐山麻浩1号崖墓为东汉晚至蜀汉时期,佛像刻于墓前室东壁门楣石上,通高37厘米,面部已残,高肉髻,头后作圆形项光,身着通肩大衣,右手似作施无畏印<sup>[17]</sup>。2001年在重庆市丰都县槽房沟墓群的9号墓出土有“延光四年”题刻的摇钱树底座,其上发现有铜佛像,这次考古发现引起了较大反映。延光四年即125年,发掘者称这是目前已知有确切年代最早的佛像<sup>[18]</sup>。除了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佛像外,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发现。据孙机先生考证,江苏连云港望山的摩崖造像,其中包含有部分属于东汉晚期的佛教造像。特别引起研究者兴趣的是山东滕县出土的一块东汉画像石残片,上面刻有很明确的六牙像,这一形象在佛教传统中称为“白象宝”或“白象王”。在徐州市铜山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也刻画有3枚长牙的象<sup>[19]</sup>。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内地和印度就已经有了商品和文化交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大夏国所见到的蜀布、邛竹杖是从身毒(印度)国辗转运输过去的,说明在西汉时蜀中商人已能和印度通商。在中国文献中也多次出现过天竺(身毒)的国名,如《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天毒之国,偎人爱人。”《山海经》研究者多认为属战国时期的作品。这说明在战国甚至以前中国内地就和印度有文化交流。又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有闽濮、鸠僚、僰越、裸濮、身毒之民。”这说明了印度人久已侨居于滇越。而印度早就有了用“支那”称呼中国的国名。苏仲湘先生《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一文指出:“支那”一词在印度于公元前5世纪已经成型的《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两部大型史诗中,已经有了将中国称为“支那”的记载,并且认为“支那”指的是“荆”而不是“秦”<sup>[10]</sup>。一些

学者认为《楚辞》中有关陆离的记载,如《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九章·涉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中的“陆离”即是琉璃。史树青先生认为:“陆离与琉璃一音之转,陆离即壁琉璃做佩饰。”<sup>[11]</sup>这种出现于楚墓的琉璃珠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物证。方国瑜先生认为解放后出土于战国楚墓的“料珠”,“梵语称为壁琉璃,意即宝石,多见于佛经,琉璃传入中国,以楚墓出土的为最多,时间多在前四世纪中叶,是楚国商人从这条古道(即南方丝绸之路)运进的。”<sup>[12]</sup>张正明先生也基本同意并进一步申明此说<sup>[13]</sup>。方、张二先生还认为中印之间古代交通古道是一条比北方丝绸之路更早的南方丝绸之路或宝石之路。顾颉刚先生从张骞出使西域时见到蜀布一事也推测汉以前的康藏间的商路必逐渐开展<sup>[14]</sup>。

中国同印度之间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人员和物质交往,应该说文化交流亦随之开展,印度的佛教也应该早就传入中国内地。但就目前所知,文献阙载,而考古还未见有相关报道。这种现象大概与佛教创立之后自身的发展及内部发生斗争分化有关系。据历史记载,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5世纪中,其后公元前4世纪左右,佛教僧团因传承和见解不同发生分裂,形成部派佛教。公元前3世纪由于孔雀王朝国王阿育王在位时(公元前268~公元前232年)极力推崇,佛教在国内外得到广泛流传,即位17年,在华氏城(即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举行过三次佛典结集,并派传道僧到国外远及波斯、希腊诸国布教,这对以后佛教的东传发展很有影响。2世纪在迦腻色迦王的大力扶持下,佛教发展更盛。

从佛教发展的历史来看,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期,也是佛教向外传播的时期,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战国晚期至东汉时期。据目前考古所知,中国内地出土的佛像和与佛教有关的文物,其时代都还没有超过西汉以前,基本上是东汉及其以后的作品,这与当时佛教向外传播的历史基本吻合。由此结合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材料可以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应当在两汉时期。

### 三 狮子进入中国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文献就有关于狮子的记载。《穆天子传》曰:“狻猊□野马,日走五百里,食虎豹。”郭璞注曰:“狻猊,师子,亦食虎豹。”《穆天子传》是晋代从战国时魏王墓中发现的先秦古书之一,共有六卷,前五卷记周王八骏西游故事,其中保存有一些古代中西交流的史料。汉人辑录周代语言文字的《尔雅·释兽》中也谈到:“狻猊如□猫,食虎豹。”郭璞亦注:“即师子也,出西域”。

“尔雅”的“雅”,即孔子所说的“雅言”,是关中地区的夏言。总之《穆天子传》、《尔雅》都是具有西部地区文化背景的作品,其所谈到的“狻猊”,是中国先秦时关于狮子最早的记载。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的象征物狮子见诸中国古代史籍增多。《后汉书·章帝纪》记载:章和元年(87年)“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章和二年,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另外在《和帝纪》、《班超传》中也都有西域献狮子的记载。《洛阳伽蓝记》曰:“师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仁辅黄图》卷三记载长安城奇华宫附近的兽圈内家豢养了“师子”和“大鸟”。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狮子的石雕。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前有一对石狮,这里的石阙铭文记载:建和元年(147年)“孙宗作师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于史籍和石雕像中的狮子几乎都写作“师子”。中国在先秦时期原就有了现成的狮子名称“狻猊”,为什么此时文献弃而不用,另起炉灶写作“师子”?《说文》云:“狻猊如𧆇猫,食虎豹者,从犬声”,“𧆇素官切。”狻即酸声,与师的声部相同,大概也是音译词,从犬部只是表示它为一种兽,而𧆇是音译过来的声部。白化文先生说:“梵文称狮子为 simha,巴利文称之为 siha。”<sup>[15]</sup>两字的声部相同,只是写法不同。如果把“师子”写作“狻猊”,岂不更名正言顺?但汉代文献中都一概写作“师子”。这其中当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史实,那就是正在东汉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并日益受到重视,附丽于佛教的狮子自然也受到信徒的礼遇,尊称为“师子”,如果以原有的动物名称呼这一护法灵兽,岂不是对佛的大不敬?因此用“师子”一词取代现成的“狻猊”来称呼狮子动物,正与东汉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形成燎原之势的史实若合符节。

白化文先生也认为狮子传入中国,基本上和佛教传入中国同时同步。他说:“从文字上看,古代中国没有狮字,最早的文献均音译为并写作师子,这是带褒义的译法,看来也与中国人对随外来宗教大规模地在译文中出现的这个外来语的敬畏有关。”<sup>[16]</sup>孙机先生根据东汉时和后来的狮子形态的差别来判断东汉时期佛教传播的形势,他说:“(山东)武氏祠石雕狮作迈步欲进之状,与南北朝时仿自佛像狮子座的蹲踞之狮不同,却正和这时佛教的传播未臻全盛的形势相合。”<sup>[17]</sup>

### 四 中国的狮子文化

由于狮子在佛教中是护法者形象,又是文殊菩萨的坐骑,孔武有力,凶猛强悍,它在传入中国后,其形象立即被人们用来作为护卫者和辟邪物,起着保护主人平安、吓阻凶恶的作用,发展成为一



种独立于佛教的中国狮子文化。汉唐时一些官宦之家及宫廷四门、里坊门前都立有石狮。唐时宫门四面列置石狮且不止一对。元代门前置石兽已蔚然成风,《新津志辑佚·风俗》记载“元代‘都中显宦硕税之家,解库门首,多以生铁铸狮子,左右门外连座,或以白石凿成,亦如上放顿。”这大概是我国看门石狮出现时间最早也是最详细确凿的记录。

石狮除了护卫辟邪的功能外,在后代还衍生出了标识主人地位权威,寓意富贵昌盛的符号意义。后代门前石狮列置的数量造型都有定制,这些门前石狮全都成双成对,形状各异,居门右的是雄狮,居左的是雌狮,雄狮左前爪下踏一只球,俗称“狮子滚绣球”,雌狮右前爪下踏着一只小狮子,俗称“太师少师”。雄狮脚下的球既是权力又是统一寰宇的象征,而雌狮脚下的小狮则象征子嗣昌盛。另外狮子头上的疙瘩多少也有讲究,凡一品官员府第门前的狮子头上有13个疙瘩,人称“十三太保”,而一品之下,每低一级就要减少一个疙瘩,直到七品以下不准再有狮子陈列了。再者狮座下面的四面花纹也不相同,一般正面要刻瓶盘,以及三支戟,借其谐音“平升三级”,右面则刻有牡丹与松柏,象征着富贵长寿,刻笔墨纸砚文房四宝,象征文采风流;背面刻“八卦太极图”,象征镇妖治邪<sup>[18]</sup>。

人们除了在门前立狮子像外,重要建筑还在屋顶上塑制狮子形象,同样表示驱恶纳祥的意义。在屋顶除鸱尾外,还有象征吉祥的瑞禽异兽骑坐在屋顶的垂脊和戗脊上,这些瑞禽异兽至迟于唐代已见使用。但造型名称数目历代各有不同,清代按官式做法主要有龙、凤、狮、麒麟、天马、海马、獬豸、猴等,甚至于房屋梁架上,屋檐下的斜撑、牛腿、梁枋上的小立柱两旁都可以发现狮子的行迹。

在一些墓葬的神道上也常见狮子的形象,它怪诞夸张,十分吓人,可以起到辟除邪恶的作用。四川芦山东汉巴郡太守樊敏墓、杨君墓及雅安高颐墓等墓前都立有石狮。如杨君墓前出土的两具石狮,红砂石圆雕,雄雌配对,通高达1.7、长2.3、宽0.66米,其造型方中有圆,简洁大方,四肢粗壮凝重,作昂首张口、挺胸翘尾状,高颐墓前的石狮,创作于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其造型昂首挺胸,四腿拉开,作行走姿态。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六朝陵墓上也立置了不少石兽,其中就有狮子的形象,它形体高大,四肢特别粗壮,颈部及狮身线条刚劲有力,整座狮子形象与真狮子不完全相符,但整体形态却十分威武雄壮,充分表现了护卫者的雄姿。唐代从乾陵开始在帝陵神道上立石狮已为定制。唐陵前石狮的特点是形体高大,形象比南朝石狮更接近真狮,但仍用夸张手法。腿爪都特别

粗大壮实。宋代如开封、巩县帝陵,也有石狮列置,比起南朝、唐代更具写实性,体形更接近真狮原形,狮子的头及头上的卷毛都接近真实,其四肢和狮身轮廓也用了夸张手法,但整体神态却不如唐代石狮威武有力。明代继承唐以来的制度,帝陵前也以石狮作为石象生之首,陵前列置石狮之多为历代少见。如位于江苏泗洪县的明祖陵神道上立蹲坐的石狮达8对。明清时更多的是石、铜、铁制狮子。其特点是形象更写实了,造型比过去复杂,细部刻画多,如四肢有肌肉起伏,头上有卷毛,身上带着铃铛,但不大注意狮子整体的气势<sup>[19]</sup>。总之,从东汉起各代陵墓神道上几乎都立置石雕狮子,它傲然雄立,春秋迭代,始终承担着守墓的责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石狮的造型不断变化,在表现其护卫陵墓的同时,又表现出其可亲的一面。

随着狮子进入中国寻常百姓的生活,一种以表现辟邪、吉祥、欢乐的狮子舞产生了。狮子舞是由人扮成狮子的舞蹈,经过千百年民间艺人的创作与提炼,逐渐有了一套较系统完整的程式和内容。在表演上可分为“文狮”和“武狮”两种。文狮主要表现狮子温顺的神态,而武狮主要表现狮子勇猛的性格。每到吉庆和重大典礼时,场内鼓锣铿锵,热闹非凡,舞狮者时而登高跳跃,时而打滚抖毛,亦庄亦谐,赢得观众满场喝彩,给节日增添浓浓的气氛。

[1]齐东方:《汉弘墓人兽搏斗图像及其文化属性》,《文物》2006年第8期。

[2][16]白化文:《狮子与狮子吼》,《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

[3]《后汉书·楚王英传》。

[4][6][15]《后汉书·襄楷传》。

[5]《三国志·吴志·刘繇传》。

[7]杨弘:《美术考古半世纪》,文物出版社1997年。

[8]刘军社:《中国最早铜佛像惊现丰都》,《永不逝落的文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9][17]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50页。

[10]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

[11]史树青:《陆离“新解”》,《文史》1981年第11期。

[12]方国瑜:《镇史论丛·从秦楚争霸看庄防开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张正明:《小玩艺与大世界》,《梦梦学刊》2000年第5期。

[14]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第38页。

[18]高林生:《金銮殿前话双狮》,《文史知识》1987年第9期。

[19]徐吉军:《长江流域的丧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96页。